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1年7月20日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开启我国人口发展新阶段。在国家陆续颁布实施的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中,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引发了公众的密切关注。本文深入剖析了托育机构建设面临的挑战,并就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优化生育环境作出建设性思考。

加快完善托育服务 切实优化生育环境

■ 胡晗 姜全保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1年7月20日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开启我国人口发展新阶段。在国家陆续颁布实施的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中,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引发了公众的密切关注。笔者2021年10月在陕西A县就此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将结合调查结果,深入剖析托育机构建设面临的挑战,并就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优化生育环境作出建设性思考。

托育机构建设面临挑战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调整,价格适中、方便可及、安全规范的托育服务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求。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托育机构,还面临价格不清、人才不足、政策空缺等挑战。

首先,普惠性托育机构服务价格制定存在疑惑。调查反馈显示,各级政府部门在普惠托育机构定价操作中存在困惑。因普惠托育准入标准不属于政府指令性定价,物价部门不予定价;原则上由各区县卫生健康部门通过市场形成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具备招标条件的,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价格水平;不具备招标条件的,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价格水平。规定上的不清晰,导致目前普惠性托育机构没有统一明确的价格标准。

第二,托育行业人才与相关配套政策不足。目前托育服务市场面临很大的人才供给和普惠性托育需求缺口,高质量托育人才供给不足。据调查,托育机构保育人员的薪酬普遍偏低,因不属于教育系统,故无教师编制,工资待遇与养老保障的稳定性较低,导致人员流动性强,难以吸引优秀的从业人员。

第三,托育服务配套政策欠缺。我国法律法

规中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公共托育和保教服务的针对性条款欠缺;婴幼儿早期照护服务尚未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处于监管真空状态;调查中发现部分家庭反映对托育机构不信任,相当部分的机构只教不保,课程质量和科学性无从考察,收费标准缺乏合理性,并未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那些低收入且需求强烈的家庭,不得不把孩子放到缺乏规范与相应资质的托育机构,直接影响和制约了0-3岁早期教育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完善托育服务的相关建议

根据国家卫健委设定的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在深入了解托育机构运营情况与生育家庭迫切需求的基础上,笔者从加快建设步伐、增加机构数量、规范收费水平、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质量和数量上加快托育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回应托育机构需求,通过以奖代补、减免税收等措施降低托育机构收费标准,激发社会力量办托育的积极性和活力,扩大托育机构覆盖面;大力推进社区婴幼儿托育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的建设,将社区托育服务建设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和配建年度目标;加强托育机构质量监管,尽快出台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婴幼儿卫生安全标准,对托育机构师资、课程质量、食品安全等开展动态评估,逐步引导托育机构质量持续提升。

其次,在提升托育机构质量的同时,应增加幼儿园与托儿所数量。调查显示,孩子0-2岁期间,家庭最期盼就近建立公办婴幼儿免费或低于市场价格的托管中心、弹性工作时间、发放婴幼儿养育津贴等;3-5岁期间,家庭最期盼政府和社会提供有优惠政策的公立幼儿园、普遍提高师资水平和办园设施,部分家庭表示幼儿教育成本高,希望将

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因此,在扩大常规幼儿园保育机构数量之外,应积极推广就近入托的社区型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普惠性托育服务采用托幼整合的模式,融合托育服务和早期教育,一并吸纳至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之中。

第三,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合理制定托育机构收费水平。据调查,大部分家庭可以接受的托育机构价格在2000元以下,导致了相对便宜的公办托育机构“一位”难求,民办托育机构空“位”较多。托育机构价格应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财政收入水平作为主要参照依据,出台统一区域标准的同时,设立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系数。制定并实施自律性行业准则,杜绝收费高、乱收费的现象,引领托育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第四,应加强托育人才供给与政策引领。提高托育行业的人才供给,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可根据需求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严把教育培训关,加快高质量从业人员的输出;通过调动婴幼儿家长、幼儿园从业人员、行业专家学者等人力资源方式充实托育指导服务队伍建设;将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员纳入培训规划,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水平。

此外还应完善早期教育政策。为改变目前0-3岁早期教育事业无序发展现状,补足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的短板,首先应尽快明确0-3岁婴幼儿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负责0-3岁托育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发展和监管;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指导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并出台相关托育机构建设标准、管理规范的细则。

多措并举优化生育环境

在加快托育机构建设的步伐同时,还应多

措并举,真正优化生育环境,推动积极生育政策落地。

首先要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推动构建与社会经济相符合的新型婚姻伦理,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帮助适龄年轻人进入婚姻;培育更加理性的育儿理念,加强媒体对科学育儿理念的宣传,纠正养儿攀比问题;规范孕产妇与婴幼儿用品市场,鼓励制造商推出平价优质商品,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第二,用人单位及全社会应增强对职业女性的人文关怀。政府应承担企业雇佣女性的部分成本,引导企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鼓励企业积极落实对孕产期女员工的倾斜政策,例如推行弹性工作制等。调查发现,约1/3的女性在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私企和个体工商户中尤其严重。故应保证产前检查、哺乳期间的工资发放,同时制定企业产假制度落实的奖惩细则,稳定女性返工后岗位。家庭和社会应积极肯定女性的生育贡献与养育价值;强化养育过程的父职履行与父亲参与。

第三,多措并举提高生育家庭福利。保障多孩家庭的财政补贴;完善生育医疗保健体系,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包括探索对多孩孕产妇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户籍产妇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降低孕产基因筛查、孕中母婴保健、产后母婴护理、新生儿管理服务成本,等等。

此外,应关注生育困难群体诉求。对现代妇女生育年龄普遍延后的现实,探索不孕不育等生殖辅助技术支持政策;加强高危孕产妇管理措施,针对孕产妇的具体妊娠分娩情况,切实加强妇产科临床设施资源和专业医务人员资源的配置,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姜全保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胡晗为该校助理教授)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伦理特征》

作者:李勇

政治伦理和关怀伦理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中的两大基本伦理要素。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实现了从政治伦理占主导地位向关怀伦理占主导地位的转变。从共时性层面看,政治伦理和关怀伦理始终交织在一起。政治伦理主导下的妇女解放和女权话语的生成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在这种互动所带来的关怀伦理主导地位的转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实现更新和超越,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5期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

作者:卜卫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女性主义思潮及理论涌入国内妇女学界和传播学界。本文回顾了其理论旅行的过程和结果,说明其理论旅行逐渐浮现出三个主要分析框架:传送模式+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以及传播行动主义研究。无论何种框架,社会性别理论大都被置于分析中心。虽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备受批评,但以媒介监测为特征的“传送模式+女性主义”研究被中国妇女活动家利用成为一种行动者媒介。由于媒介与性别研究发源于妇女学界,且与中国在地的妇女运动密切相关,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行动或实践特征,表现在政策游说和倡导、媒体批评及促进城乡性别平等文化建设和等方面。在女性主义思潮与传播理论融合的过程中,“知识生产的理论偏向”“妇女概念”“媒介概念”“在地知识概念及传统”得到反思。本文还提出有利于地方知识生产的研究策略。

来源:《新闻传播与研究》2021年第9期

《少数民族女性的性别意识与政治效能感》

作者:胡荣任 重远 宋阿沛

政治效能感影响着个体政治的情绪唤醒和参与政治行为的动力,是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本文通过CGSS2010的调查数据分析少数民族女性的性别意识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发现,性别意识对于少数民族女性内在政治效能感具有显著性影响,接受高等教育、政治面貌、户口、自评社会等级均会对少数民族女性内在政治效能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性别意识对于少数民族女性外在政治效能感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年龄、收入、户口等人口学因素对少数民族女性外在政治效能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范语晨 整理)

观点秀场

从成为“理想女性”到实现“女性理想”

——从影视作品看女性职业角色的变化

“三孩”政策出台已有时日,线上线下对三孩生育意愿的讨论依然热烈,其中,对女性职业角色与发展的考量构成了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亦有呈现。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热播影视剧中对女性职业角色的刻画方式,分析其背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与性别观念的变迁。

■ 李西

“三孩”政策出台已有时日,线上线下对三孩生育意愿的讨论依然热烈,其中,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考量构成了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很多影视作品中亦有呈现。本文将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热播影视剧中对女性职业角色的刻画方式,分析其背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与性别观念的变迁。

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职业:从背景板到身份主线

1990年,电视剧《渴望》掀起收视热潮。剧中由张凯丽饰演的刘慧芳温顺善良,甘于奉献,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好品德,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满足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对女性的所有期待——不仅是男性视角里的完美女性和理想伴侣,也是不少女性心中的成长标杆。

传统作品中,女性形象多依托家庭,以妻子、母亲等家庭角色出现,并将其刻画为符合大众期待的理想女性形象。角色的主线围绕家庭与情感展开,职业角色仅仅作为剧情设置的背景板被一笔带过。就像《渴望》中的刘慧芳,剧中除交代她的职业是工厂女工外,对她的工作日常并无更多呈现。

与《渴望》不同,今年暑期的热播剧《我是真的爱你》虽褒贬不一,却在多个平台引起了较高的话题热度。这部剧讲述了三位女性在职场和情感上的成长。由刘涛饰演的萧嫣,公司高管,丁克一族,有着自己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人生态度;王媛可饰演的陈娇蕊,同为公司高管,生育女儿、重返职场后,在家庭和职场的平衡中不断循环着撕裂和修复;李念饰演的尤雅作为全职妈妈乐在其中,在经历家庭变故后开始创业。剧中三位女性都基于自己的选择,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调试自我,以寻求既能满足初心又能兼顾现实的一个平衡点。

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女性的职业等社会角色成为塑造形象的侧重点,多讲述女性在职场中谋求生存,在现实磨砺中奋斗成长的故事。女性



角色可以是妻子或母亲,但首先是她自己——有事业、有社交的独立女性。就像陈娇蕊并非必须作为子女牺牲事业的母亲,而是享有将事业放在首位的自由。而女性的友谊、事业等都可以作为影视剧主线支撑一部作品,例如夏赢得口碑的《我在他乡挺好的》,展现了四位女生在他乡生存、立足、扎根和奋斗的图景,以及她们面对选择的妥协与坚守。这些作品多以女性角色的职场发展和个体成长为主线,女性的“理想”贯穿始终,女性的职业角色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得到剧情和镜头的高度偏爱。

影视剧创作侧重点的变化,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变迁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实现了从“成为理想女性”到“实现女性理想”到蜕变。



贤妻良母还是事业强人:“理想女性”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倡导下,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政府淡化性别差异的宣传,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女性的就业范围得到扩展。据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57年女性参与就业的数量达到13.4%。在人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时期,家庭和性别差异被淡化,没有对女性形象的特殊化期待。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嵌于社会体制中,尚未构成私人领域,家务劳动没有进入社会讨论的视野,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家务劳动还是依照传统由女性承担,工作和家庭的冲突通过女性承担双重任务被抑制。女性参与就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发展状况持续到改革开放前期。

改革开放后期,国企改革和体制调整对女性就业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让妇女回归家庭的传统思想再一次出现,家庭也逐渐回归私人领域。女性的职业选择出现分化,有一部分女性选择重新回归家庭,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角色,“相夫教子”成为大众及相关女性自身赋予自己的主要任务,

职业对于她们仅是作为生活中获取收入的一个途径,很难构成事业,因此她们对职场晋升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期待,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家庭中,社会上由此构建起女性作为“贤内助”的“理想女性”形象之一。在1986年的“理想的女性与女性的理想”讨论中,贤妻良母、超贤妻良母和事业型、事业和家庭两全型被同时看作理想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理想之一。

走向全面发展与自我成就:“女性理想”的实现

在女性选择的分化之中,也有一部分女性在社会变迁大潮里抓住了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在职场有了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多的选择空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社会地位不断攀升,在职场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发展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的家庭分工作出相应调整,家庭中的丈夫角色需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家庭工作,女性完成了从传统家庭分工的主力到职场人的转变,更加独立而平等地进入了职场。从家庭分工中剥离的程度与职业的参与深度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在职场的深度参与得到进一步强化,职业不再仅仅作为收入来源,而是可以称之为事业,女性开始追求自我理想的实现。相较于1986年的讨论,新时代的理想女性更接近于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女性形象。

背景跨度较大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两位女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程开颜是传统“理想女性”的代表,温柔顾家,没有更多职业追求;梁思申则是新时代“女性理想”的化身,拥有优异的教育背景,抓住机遇在职场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从迎合“理想女性”到追求实现“女性理想”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撕裂,如果家庭分工不能够很好地支持职场需求,那便会出现如《我是真的爱你》中女性选择的分化。而当女性的职业发展承载了更多自我实现的期待时,家庭便不再是女性自我实现的唯一选项。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也就不仅是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需共同面对的问题。

从“理想女性”到“女性理想”的变迁,影视作品中心女性角色塑造的多元化,反映出随着性别平等的不断推进,社会更加重视女性的自主性与全面发展。在经济和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女性的多样选择日渐被认可,她们的多彩人生得到尊重和欣赏。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